

# 日本老龄产业：我们能从中借鉴什么？

目前,从64岁以上人口比例所代表的老龄化程度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率相当于日本90年代的水平,且老龄化率加速的趋势与日本也极为相近。

我国呈现出高龄劳动人口占比高及“未富先老”特征。从整体上讲,日本的老龄化时期发展特征对中国的老龄产业研究仍极具参考价值。

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阶段,目前已经是人口3000万以上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

从人口结构看,日本1970~1990年老龄化上升趋势较为缓慢,64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1%上升至11.9%,而1990年后,日本老龄化进程加快,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28.4%。1997年日本首次出现了少年人口低于老年人口的现象,2005年日本总人口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老龄化背景下日本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日本70年代基本完成城镇化,家庭收入快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70~90年代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中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增速呈现中速增长,日本这一期间虽然GDP增速持续下台阶,但人均GDP快速增长,并成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90年代后,日本人口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再到超低生育率的转变,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超低增长阶段。

日本人口出生率从1920年前后开始下降,但在当时其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下降速度加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1970年之后。二战后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学历升高及工作机会的增多,使得晚婚晚育及少子的倾向加强。而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不景气,社会收入差距较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不婚不育”或“婚而不育”,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1990年日本女性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37.9%,2000年增加到40%,到2018年达到了44%,日本女性的就业率逐年提升。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数据,中国2002年的64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8%,超过7%的临界点,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从老龄化程度来看,截至2019年,我国64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1.5%,大幅低于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大概相当于日本90年代、德国60年代水平,处于老龄化初期阶段。

但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我国64岁以上人口占比的上升速度,还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我国都明显快于美国和德国,基本与日本的速度相当。

亚洲国家老龄化速度较快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近五十年来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二、亚洲国家在移民政策上普遍相对保守,加速了国内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三、亚洲国家受教育程度高,但在全球化分工中主要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本回报率更高的背景下贫富分化加大,叠加文化的因素,生育率的下降速度相对较快。

日本老龄化社会有何特征

人口变化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社会消费、储蓄、投资行为,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宏观层面,最直接的影响是日本的人均产出在90年代后停滞不前。在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背景下,日本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费用膨胀、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出现了“失去的三十年”。随之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环境,以房价和十年期国债利率为表征的资产回报下降。

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消费对GDP的贡献提升,1991年至2013年,消费占GDP的比重逐步从53%提高到59%。但从结构上看,70年代~80年代是日本人均GDP提升带动的消费升级,但90年代后,人均GDP规模并没有太大增长,但消费比例增加,其中食品、服装等必选消费整体占比下降,医疗、教育娱乐、房租等服务性消费整体占比明显提升,进行了以服务业为导向的二次消费升级。

一国的储蓄水平反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日本的储蓄率自1990年起便不断下降。至2013年时日本总储蓄占GDP的比重降至20%,比起1990年时的35%下跌了15个百分点。日本的低储蓄率或许与日本90年代以后的失业率偏高有关。

失业率提升,叠加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居民资产负债表被破坏,负债率大幅上升,对

日本居民的储蓄率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经济学理论,家庭可以分为流量受限和不受限的家庭。流量受限消费者只能消耗储蓄,原因是他们没有其他可变现的财产,或是没办法借到钱来维持最优化其效益的消费水平。日本政府2004年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1988年以后,日本流动性受限消费者的数量占比明显增加。

经济增长停滞的后果在微观上表现为居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升。由于经济长期面临“通缩”压力,日本员工工资长期没有增长。1998~2003年期间,上班族的平均薪资是下滑的,这一时期贫富差距也有所扩大,中低收入阶层(收入600万日元以下)占比上升至78.9%,中上收入阶层占比下降至21.1%,且中产阶级加速向两头分化,“M型”社会初现雏形。

2013~2017年,日本经济复苏推动企业盈利增长74%,雇员工资上升9%,企业盈利增长幅度仍高于工资幅度。而日本企业也更多地通过雇佣兼职员工,而非全职员工,或者给现有员工增加奖金而非加薪,来延缓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盈利的压力,因为兼职员工的工资水平低于具有合同保护的全职员工水平。全职劳动者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84%下降至69%,2013~2016年,全职员工数量仅增加1%,而兼职员工增加了11%。

社会组成方面,“低薪”导致年轻人的“供给”减少,表现为降低生育率,从而使得日本的独居家庭增加,核心消费人群是“单身贵族”。据日本2016年国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一共有5184万户家庭,其中独自成家的户数有1679万,占比32.4%,而夫妇与孩子共同组建家庭的户数是1444万,占比27.9%,独自成家的家庭已经占了大部分。独居家庭的增多增加了对小分量商品的需求,百货商场逐渐衰落,并发展出了便利店这样的零售业态。

为解决日本经济的长期通缩,90年代后日本政府采取增加公共支出、扩大基建投资的措施刺激经济,并通过大量发行国债融资来弥补税收收入的不足。特别在2012年之后,大力推行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新政,结合了灵活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试图重振日本疲弱的经济,终结长期通缩和缩减公共债务。截至2017年,日本政府杠杆率超过200%,但在低增长环境中,并未产生明显通胀。

尽管努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老龄化社会持续转型升级的方向,但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老龄化对资源的消耗也提升了转型的难度。

2019年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在第九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上,曾对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高增长发表了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他认为,在老龄化情况下,社会整体就变得更加地关注如何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并将经济资源大量配置到与老龄化有关的领域后,使得资源配置到对经济增长有用的领域变得越来困难。即便从个体企业的角度,应对老龄化时的AI技术和机器人的应用创新可以改善个别企业的生产率,但从宏观整体生产率的角度来看,想要提升生产率是很困难的。

老龄化急速发展,社会对创新的接受程度也在降低,部分人认为的“即使人口减少了,但靠创新可以改善生产率”的观点可能过于乐观。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转型升级“早做早好”,需为老龄化社会尽早进行资源储备。

日本老龄化主要影响了哪些产业

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与日本90年代初接近,那90年代以后日本老龄化程度加速上行阶段对各行各业产生了什么影响?

1) 医疗

日本在1957年通过立法建立全民医保制度,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非公共养老保险组成了养老体系三支柱。

老龄化程度的提升首先体现的是日本国民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长期提升,从1955年的2.8%、1975年的4.25%逐步提升至2017年的7.87%,1975~2017年复合增速4.6%。2019年日本中央财政支出中34%用于社会保障,而从整体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上来看,养老金支出占比由80年的40%左右升至19年的近50%。

但1990年后日本整体的用药规模增长十分有限,受到医药政策的调整和医保控费的影响,降低了药占比,家庭平均的药物消

费支出在2000年后呈现负增长。但家庭对医疗服务的支出持续提升,显示老龄化社会下最直接受益的是对老龄人群的服务类行业。

日本也统计了针对老年人的医疗卫生费用,2015年为15万亿日元,较1983年的3.3万亿日元增加了3.5倍。从细分项目的期间复合增速来看,药房配药支出在1983~2015年复合年增长18.5%,在1990~2015年复合年增长21.4%,居各项目之首。1994年后新增了对家访护理的统计,1994~2015年的年复合增速也达到了19.6%的较高水平。

药房配药增加给医药流通行业带来较大的利润增长空间,家访护理增加则提升对服务性行业的需求,这与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有关。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推行《护理保险制度》,吸引大量养老企业进入市场。

《介护保险制度》的颁布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开发商通过在房屋内配备符合该法律要求的设施和看护人员后,提供的相应服务最终可以由介护保险买单。该法律推出后的6年间,收费养老设施等护理服务机构从257家急速增加到1732家,年平均增长率为37%;2000年时的养老服务市场规模只有3.6万亿日元,2013年,市场规模扩大到了9.6万亿日元。从床位数量来看,日本整体的医疗机构床位数量在90年代后小幅下降,但疗养用的床位数占比从1993年的0.2%快速提升至2003年的20%。

前面提前到医保控费的影响,也使得日本医药行业的竞争格局改变,研发构建创新药成了竞争壁垒。目前制药企业集中度较高,截至2020Q1,日本前四家制药企业武田、第一三共、安斯泰来和中外制药的权重即占到日本东京交易所医药指数的49%。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当深度老龄化下全民医保制度成为财政负担,药企的控费也将限制药企的收入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医药企业的营收放缓,而龙头企业更能够通过深厚的创新管线积累及并购获取新药溢价,拓展海外出口规模成为更重要的销售额增长方式。

当然,这源于各国对创新和研发的保障,赋予创新药企获得超额利润的专利保护期,因而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够有效的构建出专利“护城河”。

从人口年龄角度分析,中国和日本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1.64亿人,日本为3552.4万人,中国老龄化带来的用药需求远远超过日本。

2) 消费

整体来看,日本家庭在90年代后经历了消费降级。在1960~198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令日本人的消费品质快速提升,最先进的汽车、家电纷纷走进日本家庭。但1991年日本房地产破灭后,日本家庭可选消费品增速大幅下滑,如珠宝首饰市场销售额、高尔夫球、滑雪等奢侈消费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收缩。

从居民的消费占比来看,1980~2010年日本服务消费的占比持续提升。其中,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医疗保健、住宅类等服务类消费支出上升;食品、服饰、家用品等生存类消费显著下降,因耐用品渗透率在60~70年代伴随城镇化的基本完成而早早触及瓶颈,消费占比下降,增速放缓。

但即便消费降级,消费者也并非一味追求低价,“懂憬式”消费反而抬头。正如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中低阶层的消费者“平常在百元商店买东西,但对于室内用具的奢华就是有份执着;平常穿的是大众品牌的衣服,但就是想要个名牌包;平常吃超市廉价款,但对于味噌、酱油就非常讲究”。另外,单身工作女性也会用一笔固定的支出来“犒赏自己”,因此,同样的消费者一面追求无品牌、高性价比,一面也会追求奢华感商品。

而在零售业态上,由于中产阶级的分化,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下的中低阶消费人群占人口比重超过80%,以中产阶级为主要顾客群的百货和量贩店销量减少,百元店、折扣超市顺势抬头。即便2010年后中产阶级人数有小幅增加,但消费群体的消费理念已渐趋成熟,对高性价比的商品接受度持续较高。而作为“偶尔精致”便利店和美妆店发展较高,这迎合了消费需求小型化、便捷高质以及追求某种生活方式的特点。女性步入职场也使得消费者对便利快餐、多样化餐食及高性价比新品的需求增加。

整体来看,进入“第四消费时代”的日本在零售领域的业态呈现返璞归真的特点,回归低价、高质和实用。

3) 科技

日本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代表的“持续改进”闻名于世,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但日本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的发展方面略显不足。2018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制造业白皮书》中已经意识到数字化可能给日本智能制造产业链带来“非连续创新”的冲击,未来更重要的是通过灵活运用数字技术从而获得新的附加价值。

在老龄化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以机器人产业为例。

日本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早,在市场规模、行业应用以及技术水平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1967年,日本川崎重工从美国引进机器人及其技术,并于1968年研制出第一台日本产机器人以来,日本机器人经过70年代的快速发展、80年代的普及,90年代后进入稳定增长期。其中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资源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需求结构的调整及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是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催化剂。2000年之后,受益于出口增加,日本工业机器人景气度回升。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根据应用场景,将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两类。日本机器人产业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是运用工业机器人填补劳动力的人口空缺,二是运用服务机器人为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服务。

德国库卡、瑞士ABB、日本发那科、日本安川电机合称为全球四大机器人家族,2017年全球市场份额分别为发那科(16%)、ABB(14%)、安川电机(12%)、库卡(11%),合计超过50%。在工业机器人各个细分应用领域,安川、发那科等日本机器人制造商均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在机器人产业链中,控制器、传感器、减速机、伺服电机、数控系统等上游关键零部件,占单体机器人成本的70%以上。发那科、安川电机等全球领先的日本机器人生产企业也都具备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

并且,日本机器人企业具有持续创新的能力,以安川电机为例,公司2007~2011年间工业机器人专利申请数为318件,截至2014年公司在全球的专利注册总数约为2900件。同时,公司的零部件高度自制,技术优势使得公司更具竞争力。

2013年后海外市场对机器人需求提升,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明显增长。安川电机来自亚洲营收从2009年的828.3亿日元到2019年的1643.18亿日元,几乎翻倍,再叠加利润率以及毛利率的上升,为公司增加了巨大的营业利润。

2010年后,中国的劳动力增量也在逐渐消退,此阶段对机器人需求的提升正好与80~90年代日本劳动力增量回落刺激对机器人的需求提升相类似。

日本老龄产业启示

“越来越富”与“越来越老”,这是一般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发展趋势。往后看,中国也将经历人均收入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的90年代,人均GDP水平类似于日本和美国的80年代中期,并且从老龄化的速度来看,中国的确更像日本。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两项宏观的变化也将带来产业的巨大变化:

(1) 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意味着消费在GDP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居民对高品质消费、健康消费、休闲娱乐消费的要求不断提升,消费理念逐渐成熟;

(2)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速,在城镇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成本上行的压力,而努力提升高附加值产业的占比,从而增加在国际分工中利润分配的比例则是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趋势。而中期来看,中美大博弈的长期存在增大了国家对科技“补短板”的重视程度,发展中国高端制造、替代进口产品的进度加快。

1) 医疗产业:养老服务+创新药+医疗器械

首先,国内养老产业的发展还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截至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费用4327元人民币,而日本2017年人均医疗费用达到2.2万人民币。但2000年以来,国内人均医疗费用增速均在10%以上,而日本已进入相对稳定期,年增速在2%~3%附近。

从医疗机构和床位数的对比来看,截至2017年,二者国内数量也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半, (下转第25版)